省委机关报[15]。再如可从记者报道中研究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著名军事记者张帆始终活跃在华北和西北战场前线，从绥远到冀、察、热、辽，深入连队冒着生命危险到处采访，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解放兰州、解放宁夏诸战役，写下了大量新闻和通讯[16]。此外，从报纸刊载内容中了解新闻教育事业，发现其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趋势，陆续开办短期训练班和新闻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与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讲课任务和主持日常工作主要由《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晋察冀日报》等工作人员承担[17]。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每种报纸无论在报名、印刷方式、出版形式、刊载内容还是编辑人员组成上的变化或改革，都记录着新闻出版工作的发展历史，值得研究。根据地和解放区报纸的出版研究实践途径，可采用图书馆与高校院系协同合作模式，可与高校新闻传播等相关院系合作，教师从专业角度协助馆藏资源梳理，馆员从资源发现角度为教师提供研究资料，助力研究人员开展红色报纸研究；也可招募对此感兴趣的师生开展专题研究，以设立课题形式完成研究任务。研究可从影响力较大、延续时间较长，且与当代报纸有着继承关系的红色报纸入手，研究报纸创办出版、编辑印刷、记者编者、发展沿革等内容，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助力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

4.3 为思政教育提供丰富素材，服务立德树人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红色报纸都是按照战时需要在不同地区创办的，报道的内容紧密跟踪与直击战争现场，其中记录着许多著名战役、英雄事迹、典型人物，是原始、真实、丰富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材料。如对其价值加以深入挖掘，将在红色基因传承、革命资源研究、革命文化传播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8]。如1947年2月初，几乎每份解放区报纸，都登载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晋绥日报》以《向刘胡兰同志致敬！》为题发表评论。山东《大众日报》也注重英雄模范事迹的报道，如对鲁南平邑一区的陈毅担架队、滨北黎玉运输队、飞行爆炸大王左太传爆破队、莒南钢铁担架运输队、滨海高广珍爆炸大队、沂南子弟兵团、鲁中高运成与金维三爆破射击大队等先进模范单位的英雄事迹重点宣传[14]。《解放日报》则特别宣传劳动模范，最初见报的是劳动英雄吴满有，还有马丕恩及其女儿马杏儿、退伍军人杨朝臣、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模范医生阮雪华和白浪、模范小学教师陶端予等[10]，讴歌了一大批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各行各业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感人事迹。

红色报纸中报道的大量革命英雄事迹和人物，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可以很好地融入思政课堂，也可以作为服务社会的鲜活素材，作为图书馆助力全社会开展爱国教育，推动民众进行道德建设的教科书[18]。图书馆应组织力量，加大挖掘整理这部分红色资源的力度，提取红色报纸中的经典红军故事、抗战英雄人物、群众典型事迹，做成红色人物库或故事库，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素材，与学校部门或院系联合，有机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体系中，也可放入到学习强国等平台上，服务于社会。北大图书馆结合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革命文献于2020年创建大钊阅览室，大力传承大钊精神，积极弘扬革命文化，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特色文献服务相结合、“四史”学习书籍的信息组织与专题陈列相结合的合理途径[19]。同时不断推进对革命文献的整理与挖掘，加强其深入研究与实践利用，通过举办革命文献展、革命人物宣传学习、诵读红色经典等主题教育活动，以及与学校人文学部和教务部联合开展“传承北大人文精神”强基计划人文学生工作坊，积极探索融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思政教育活动，以期实现革命文化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力争成为大学校园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高校图书馆可根据自身及馆藏特色，挖掘与揭示革命资源为思政教育提供素材。

5 结语

总之，用好革命文献，弘扬革命文化，推进以文化人，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责和使命。高校图书馆要加快对包括红色报纸在内的馆藏革命文献的梳理与揭示，加强阐释性研究和创新性利用，提炼和弘扬革命文献所蕴含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求是，2021(19)：4－9.
2 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2023－01－06].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9/202108/t20210816_551494.html.
3 郑清文.试析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图书馆以文化人的途径、方式与机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3)：39－47.
4 杨宝青.民国时期解放区报纸的历史价值及馆藏介绍——以国家图书馆馆藏为例[J].新西部，2013(5－6)：115.
5 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685.
6 刘谷.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694.
7 陈文华.解放区概况[M].上海：联合编译社，1949：32.
8 晓知.简述华北抗日根据地几大报纸的发展沿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5(4)：55－56.
9 辽宁报业通史编委会.辽宁报业通史：1899－1978 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204.
10 袁文伟.抗战中的陕西民众[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168.
11 李宗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报刊[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2)：154－155.
12 刘维荣.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报刊建设的历史特点与启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1(6)：602－603.
13 陈春森，陈华.回忆八年抗日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J].中华魂，2015(8)：59－60.
14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第74卷 报业志[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01，204.
15 袁明仁.三秦历史文化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973.
16 王律.正定华北大学史话[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43.
17 谷长岭.中华文化通志：第8典 艺文 新闻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33.
18 王乐.高校红色专题特藏的价值挖掘——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1)：98－99.
19 陈建龙，常雯岚，徐清白.继承革命文化深挖革命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览室探幽[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1)：78－8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3年1月18日
修回日期：2023年2月22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The Col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Newspapers in the Base Areas and Liberated Areas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Zhang Lijing　Zheng Qingwen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document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which need more efforts to be sorted out, revealed and utilized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basic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liberation, a large number of red news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base area and liberated area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red documents. Starting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situation. Taking the excavation and collation of red newspapers of the base area and liberated areas from 1937—1949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s a practic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d newspap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reveals its collection characteristics. It also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publishing methods and the contents of newspapers in the base area and liberated areas. Then it expounds the time valu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mining and utilizing red newspapers in the base area and liberated areas.

Key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Liberated Area; Base Area; Red Newspapers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与精神底色

□谢欢*

摘要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历史目前可以追溯至1922年，2022年正好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华诞。文章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法，重点对国内外相关中英文档案进行考辨、梳理，回顾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由此总结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发展形成的精神内涵：人文与技术并重；倡导学科交叉；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立足中国，胸怀世界。

关键词 南京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教育史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2.014

1 引言

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其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历史目前可以追溯至1922年，2022年正好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百年华诞。通过这一百年的发展，南京大学已经成长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镇之一，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始终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联系，砥砺奋进，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本文拟通过对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的回顾，总结其精神内涵，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开启提供历史借鉴。

2 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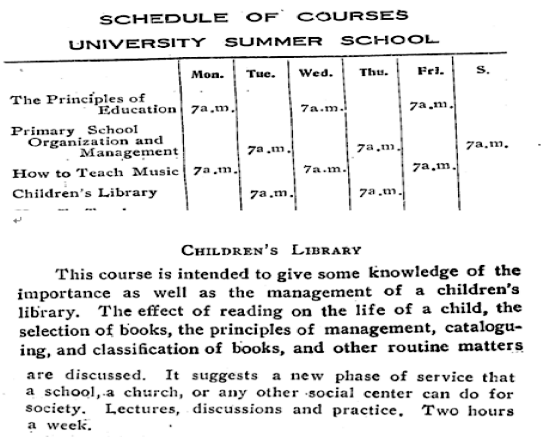
2.1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前的图书馆学教育(1922—1926)

关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源头，目前学界不少论著都将1913年美国人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入职金陵大学视作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肇始，并提出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的说法。这一说法，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这一历史公案，顾烨青、郑锦怀曾提出质疑，并进行了历史梳理，发现该说法源自对蒋复璁《珍帚集》一书中相关内容的误读[1]。顾烨青等人的考证颇为翔实，不过出于严谨考虑，并未下定论。在顾烨青等人考证“1913年克乃文金大开课”说法谬误的同时，笔者也曾详细翻阅1913年前后金陵大学出版的英文版《金陵大学公报》(*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lletin*)，该刊于1910年出版第一期，内容是对于金陵大学人事、组织、规章制度、学校概况等的介绍。此外，为了配合招生宣传，《金陵大学公报》中还有详细的课程名及课程内容介绍，但是笔者并没有在1913年前后出版的《金陵大学公报》上发现任何与图书馆学有关的课程信息。虽然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克乃文在1913年开设过图书馆学相关课程，但是并不能否认克乃文对于金陵大学乃至中国图书馆学事业的贡献，因为他在1914年正式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后，对于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中国学生甚是照顾，先后推荐“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三杰”——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赴美学习现代图书馆学(刘国钧赴美主攻哲学，但也选修了图书馆学课程)，这三人学成之后相继回国，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目前关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明确的文献记载时间是1922年。1922年，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在暑期学校开设“儿童图书馆”(Children's

* 谢欢，ORCID：0000-0003-3883-2382，邮箱：xiehuan@nju.edu.cn。

Library)课程，课程旨在向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介绍儿童图书馆的价值及管理方法，课程由刘国钧主讲，讲授内容包括：阅读对于儿童一生的影响、图书选择、管理原则、图书分类与编目及其他有关问题(见图1)。授课采用课堂讲授、讨论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课程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早上7点，时长1小时，该课程从1922年7月10日一直持续至8月18日结束[2]。



SCHEDULE OF COURSES
UNIVERSITY SUMMER SCHOOL

	Mon.	Tue.	Wed.	Thu.	Fri.	S.
Th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7a.m.		7a.m.		7a.m.	
Primary Schoo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7a.m.		7a.m.		7a.m.
How to Teach Music	7a.m.		7a.m.		7a.m.	
Children's Library		7a.m.		7a.m.		

CHILDREN'S LIBRARY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give some knowledge of the importance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of a children's library. The effect of reading on the life of a child, the selection of books, the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catalogu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and other routine matters are discussed. It suggests a new phase of service that a school, a church, or any other social center can do for society. Lectures, discussions and practice. Two hours a week.

图1 《金陵大学公报》记载的1922年金陵大学“儿童图书馆”课程介绍

在金陵大学暑期学校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的同时，南京大学另一源头东南大学也在1922年7月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作举办的暑期学校中设立“图书馆管理法组”，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32人选修了该课程，其中男性学员28人、女性学员4人，该课程授课总时长4周，于8月6日结束[3]。从1922年开始到1926年，东南大学每年都在暑期学校开设图书馆学暑期班(其中1924年因学校失火，暑假修缮房屋，改由江苏省教育会联合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另组南京暑期学校，仍旧设有图书馆教育组，并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洪有丰等担任教员)，邀请李小缘、袁同礼、刘国钧、杜定友等国内图书馆学界俊彦授课，东南大学图书馆暑期班的不少学员，如黄警顽、徐旭、顾天枢等人后来都成为其所在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领导者。

1922年到1926年，南京大学前身诸高校的图书馆学教育都是以短期培训班的形式举行，但是这些培训班的实践为在高校中正式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积累了经验。1926年秋季，李小缘正式在金陵大学文理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该课程共计5学分，14人选修了该课程，另有3人旁听[4]，由此拉开了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大幕。

2.2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27—1939)

1927年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隶属于文理科，李小缘任系主任兼教授，刘国钧、万国鼎为教授，蒋一前任助教，由此，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走上了专业教育的道路[5]。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成立不仅对于金陵大学，对于江苏乃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相较于武昌文华图专，金陵大学是当时国内著名综合性高等学府，相较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昙花一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建制一直存在。1929年，金陵大学根据当时大学组织法“每大学至少需要三学院”成立的规定，将文理科改组，分设文学院、理学院，与农林科改组成的农学院开启了“三院嵯峨”新篇章，1930年文学院正式成立，原文理科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组，并与教育学组、心理学组三组共同组建成教育学系[6]，隶属于文学院。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李小缘结合其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留学时所修课程，制定了如下课程规划[7](见表1)。李小缘的这一规划核心还是沿袭了“美式图书馆学教育”范式，以图书馆工作实践为中心，但是李小缘在学习美国的同时，还注重图书馆学理论化、中国化建设，注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中国重要书籍研究”“民众图书馆”“书史学”等课程的设置以及课程名称中“原理”“研究”等字样都能反映这一点[8]。

表1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初期课程

序号	课程名	学分	序号	课程名	学分
1	图书馆学大纲	5	9	民众图书馆	2
2	参考书使用法	3	10	索引与序列	2
3	中国重要书籍研究	3	11	书史学	2
4	目录学	3	12	印刷术	2
5	分类法	3	13	图书馆问题之研究	2
6	编目法	3	14	图书选择之原理	2
7	杂志报纸政府公文	2	15	图书馆史	2
8	特种图书馆	2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后，一直注重与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除利用金陵大学图书馆作为学生实习的主要场所外，还安排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到中央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金陵女子

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铁道部等政府机构图书馆实习参观。在“走出去”的同时，还积极“引进来”，邀请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桂质柏、外交部图书馆主任朱家治等至金陵大学为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做专题讲座，以便于图书馆学专业同学了解最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是辅修(Minor)专业，不能独立招生，选修人数总体较少，但辅修专业具有“学科交叉”的优势，得益于此，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培养出了钱存训、袁涌进、卢震京、胡绍声等一批人才，为中国及美国东亚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以后，不仅仅是针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开展图书馆学教育，还面向金陵大学全部学生开设图书馆学相关课程。相较于图书馆学专业学生课程，面向普通学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图书馆意识，增加其图书馆素养，提高图书馆使用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影响。这一点，也是金陵大学与当时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教育所不同的。

2.3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时期(1940—1946)

鉴于图书馆学系的办学成绩，早在1931年金陵大学就有将图书馆学辅修专业变为独立招生的主修专业(Major)，并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计划[9]。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一愿望直到1940年才实现。

“(1)本校原设有图书馆学辅系，历年以来，凡受此种训练者，均为图书馆所罗致，对于学生就业颇多裨益。入川以来，更有供不应求之势，且本校图书馆历年受人委托代为训练人员足徵本校对此尚能胜任，亟宜设置专修科以宏造就。(2)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中坚，现在社会教育正积极推进之中，允宜培植此项人才以资应用[10]。”因此，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于1940年1月24日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了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呈文。3月11日，教育部时任部长陈立夫正式签发部令，准许金陵大学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专修科刚设立时由刘国钧担任主管(兼职)，后由曹祖彬负责。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如表2所示[10]。

表2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课程计划

时间	课程名	学分	时间	课程名	学分
一年级上	国文	3	二年级上	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	3
	英文	4		图书编目法(西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3
	图书馆通论	2		图书分类法(西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3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	3		民众图书馆	2
	参考书使用法	3		参考实习(上)	2
	社会科学概论	3		图书馆推广	2
	党义(必修)			大学图书馆	2
	军训(必修)		二年级下	中小学图书馆	2
一年级下	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	3		专门图书馆	2
	图书编目法(中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3		参考实习(下)	2
	图书分类法(中文，上课两次，实习两次)	3		期刊及官书处理法	3
	图书选购法(附商业目录学)	3	选修(至少8学分)	装订术(1学分)，档案管理法(3学分)，博物院管理法(3学分)，图书馆与成人教育(2学分)，儿童用书研究(2学分)，书史学(2学分)，索引与序列(2学分)，教育学(3学分)，国文(3学分)，英文(4学分)，德文(3－6学分)，法文(3－6学分)，哲学概论(3学分)，论理学(4学分)，科学概论(3学分)	
	图书流通法	2			
	目录学	3			
	社会教育法令	1			
	党义(必修)				
	军训(必修)				
	暑期实习：四至六星期(交报告一篇)				

对比表1、表2不难看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体系较之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更为丰富、系统，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也更高。但是，这一课程体系仍然是围绕图书馆工作展开，对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依旧同样重视。此外，这一课程规划中除了图书馆学之外，还有档案学、博物馆学相关课程，这对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就业渠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不仅仅是为图书馆界培养人才，更将视野放在博物馆、文书档案等文博、行政系统。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立，吸引了大量学生报考，但是金陵大学对学生录取要求较高，加之战时学生宿舍紧张，故每一届招生人数都不是很多[11]。在正式招考的同时，很多位于后方特别是在成都的机构也将有关人员送到金陵大学委培，如1940年9月，位于成都的空军机械学校就通过成都市教育局致函金陵大学，希望该校图书馆有关人员能到金陵大学旁听图书馆学课程，刘国钧收到空军机械学校来函后复函表示欢迎[12]。此外，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教师刘国钧、曹祖彬、陈长伟以及当时任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李小缘等人积极走出去，为地方服务，参与四川教育厅举办的有关图书馆培训的授课活动。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同样也继承了图书馆学系时期重视与实践部门沟通的传统，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依托金陵大学图书馆以及当时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定期与图书馆界合作举行图书馆座谈会，研讨图书馆问题，同时还聘请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梁思庄、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馆长邓光禄等担任兼职教授[13]。

1945年8月，金陵大学考虑到战时其他地区考生报考不便而成都地区考生成绩欠佳，能符合图书馆学专修科录取标准者寥寥，决定暂停图书馆学专修科招生计划[14]，加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带头人刘国钧离开、李小缘全心负责中国文化研究所等诸多原因，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于1946年送走最后一位毕业生后按下了停止键。但是，图书馆学课程并未在金陵大学停止，如1947年3月15日出版的《金陵大学校刊》中介绍“金陵大学自本学期开始，借助电影方式协助图书馆学有关教学”[15]。不过，1946年以后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是面向本校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的教育以及馆内职工的培训，如李小缘1947年开始为已经入职金陵大学图书馆但没有图书馆经验的员工讲授图书馆学课程等[16]。

2.4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78—1984)

1946年以后时局一直较为动荡，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1952年国家决定对高等院系进行调整，金陵大学合并进入新的南京大学。当时中国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主要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承担，南京大学直到1978年才恢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华彬清的大力争取以及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大力支持之下，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专修科，首批学生30人通过高考于年底入学，学制三年。专修科开设的专业课包括：图书馆学概论、藏书建设、文史哲工具书、图书分类与主题、图书著录与目录组织、西文工具书介绍、目录学、外文编目、科技文献检索、计算机检索、读者工作、中国书史等[17]。专业课授课教师既有校内老师，又有校外老师，校内老师均来自南京大学图书馆，有倪波、陆伯年、陆修栋、邵士枚、杨克义、薛士权、魏德裕、平素梅、郑庆耆、吴式超、吴蕴东，校外兼职教师有吴观国(南京医学院图书馆)、卢子博(南京市人民图书馆)、邱克勤(南京图书馆)、王可权(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等，其余基础课程则是由南京大学历史、中文、哲学等系教师承担。在恢复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同时，南京大学图书馆还于1978年招收了目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两人(顾志华、卢贤中)，由施廷镛先生担任导师，同时聘请南京图书馆钱亚新先生协助指导(由于南京大学当时不具备硕士学位授予权，顾志华、卢贤中最后从武汉大学获得学位)。

1982年，鉴于首届图书馆学专修科办学成绩显著，南京大学决定招收第二届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此后至1984年每年招生。1982年，为解决因文革而导致的高校图书馆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窘境，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决定委托部分高校举办图书馆干部进修班(这一决议后来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南京大学接受了委托，面向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图书馆，招收以理工科为主的刚留馆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首届图书馆专业干部进修班于1983年9月正式开班，学制一年[18]。

1983年12月，南京大学正式任命徐竹生担任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徐竹生将“现代化”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重点，购置了现代化教学实验设备，此举也奠定了新时期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重视现代技术的基调。从1978年到1984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在专科、干部进修班的实践中逐步恢复发展，这一时期，面对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南京大学抓住时机、勇担使命，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科学研究、图书馆事业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2.5 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5—1987)到文献情报学系(1988—1993)

1985年6月6日，鉴于图书馆学专修科良好的办学成绩及基础，同时为了适应图书馆学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南京大学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图书馆学系的通知》(南字发[85]065号)，批准建立图书馆学系，邹志仁、徐竹生任副主任(主任暂缺)，至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正式恢复并面向全国招生，同时停止招收图书馆学专科生。恢复本科教育的图书馆学系确定了“在传统学科内容的基础上，实现文理渗透，以现代化管理为特色”的办学指导思想。1985年9月，南京大学图书馆学首批43名本科新生入学，与图书馆学本科新生同时入学的还有图书馆学专业首届第二学士学位班(以下简称双学位班)同学14人，这些双学位班同学来自理、工、农等专业，并已获得各自专业的第一学士学位，不少双学位班同学毕业后都留系任教(如黄奇、孙建军、朱庆华等)，为南京大学情报学的孕育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审核，南京大学正式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1987年开始招生，至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形成了本科、研究生、双学位等多层次培养体系。

图书报刊仅仅是文献的一部分，图书馆也无法囊括所有的文献管理，在被称为“信息爆炸”的年代，档案学专业、科技情报专业加入了图书馆学系，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检索教研室也逐渐发展成为文献管理教育的核心力量，图书馆学显然已不能很好地覆盖这些。有鉴于此，1988年9月，南京大学发布《关于图书馆学系更名及启用印章的通知》(南办发[88]149号)，指出根据教学及科研发展需要，将图书馆学系更名为文献情报学系，图书馆学专业成立教研室，由此也标志着南京大学从以图书馆学为主的局面进入到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并肩发展的局面，这一变动是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以及日趋繁重的文献信息管理需求，而原有的图书馆学课程也相应变化，增加了更多技术、信息管理的内容。

2.6 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994—2011)到信息管理学院(2011—)

1994年4月，南京大学为适应信息管理学科发展需要，培养社会急需的现代化信息管理人才，正式发文决定将文献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2011年又升格为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成立后，图书馆学专业与档案学专业合并组建成图书档案系，首任系主任由叶继元教授担任，2020年10月，图书档案系分解，档案学专业与学院电子政府、保密方向组织成档案与电子政府系，图书馆学专业独立组建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系。从信息管理系到信息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不断发展与壮大(2006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一级学科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一级学科，2014年一级学科被确定为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2017年一级学科评估获得“A+”并于同年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

而就图书馆学而言，在这20余年中也是取得显著成就：2003年9月正式获得图书馆学博士授予权(首届博士生于2004年9月入学)，2010年9月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21年2月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2021年6月，图书馆学专业入选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二期项目。随着环境的变迁，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发展为培养理论基础厚、知识面宽、文献功底深、掌握现代信息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具备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组织、检索、分析、评价和开发利用信息的能力，能在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与知识服务及管理工作，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综合性专门人才。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面临诸多危机与挑战，如“泛信息化”侵蚀，本科人数相对较少，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如何应对这些危机也成为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未来的重要任务。

3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精神底色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走过了百年历程，这百年也塑造了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独特的精神底色。

3.1 人文与技术并重

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其基本属性之一是人文属性，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在实践、研究和教育中都应坚守学科的人文传统，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一[19]。但是，图书馆学仅仅有人文也是不够的，需要人文与技术协调互补、共同前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人文与技术并重的路线，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再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馆学系乃至当下的信息管理学院，文献学、目录学、图书与图书馆史等彰显人文价值的内容始终作为基础核心课程存在。另一方面，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就较早地开设“索引法”等属于当时“技术型”课程的内容。到 20 世纪 80 年代，徐竹生主任将“现代化”作为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底色之一，购置现代化教学实验设备，再到当下信息系统、信息检索（侧重于技术）、数据库、数字资源管理与技术等诸多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内容的引入，人文与技术并重始终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基本底色之一。

3.2 倡导学科交叉

在人文与技术并重的基础上，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第二个底色就是倡导“学科交叉”，这在 1927 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时就能反映。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作为“辅修系”，要求学生有一个主修专业，这从现在来看，就是一种学科交叉。这一传统也延续到后来的图书馆学双学位班，1980 年代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举办针对理工科学生的图书馆学双学位班，这一探索性的文理交叉培养模式，成绩非常喜人。当下，注重学科交叉渗透，始终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的一大特色，例如叶继元教授将信息组织当中的规范文档逐渐扩展到学术规范领域，又将信息资源采购中的资源评价逐渐拓展到学术评价；沈固朝教授利用图书馆学最基本的方法与竞争情报、海疆研究相结合，李刚教授将图书馆学基本方法拓展至智库与纪念馆研究领域等等。综观当下的中国图书馆学界，特别是在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双一流高校”中，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学学科交叉融合做的是比较有特色的，大大拓展了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领域的范围。

3.3 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有机统一

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在首位华人校长陈裕光的治理下逐渐形成了“求学本旨，再求致用，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确定了“研究为教学之基础，服务为办学之实践”“研究、教学、服务”三者不可偏废[20]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与传统也为后来的南京大学所继承。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一直秉承研究、教学、服务三者不可偏废的理念，教师所授课程都是基于其自身领域的研究，例如叶继元教授的“信息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创新”课程就源于自己数十年在文献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评价领域的耕耘；郑建明教授的“目录学”“公共文化服务概论”课程，也是与其数十年的研究密不可分；还有徐雁教授的“阅读文化学”，邵波、欧石燕教授的数字图书馆相关课程等。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在研究、教学之余始终不忘利用所学服务社会，从金陵大学时期的李小缘、刘国钧，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恢复初期的倪波、徐竹生等，再到目前的叶继元、郑建明、徐雁等，都不忘利用所学服务社会。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高校日益突出的学术规范问题，教育部邀请有关专家参与制定针对高校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叶继元教授多次被邀请参与讨论，他提出的很多建设性意见得到了与会专家及教育部有关领导的认可，被吸纳写入 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高等学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徐雁教授自 2016 年以来，每年在“423 世界读书日”及“928 孔子诞辰日”前后，都会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和图书馆读者做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风、家教与家谱》等的品牌性公益性讲座，累计数百场，听讲受众十万左右人次。郑建明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起草了《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该条例经 2015 年 12 月 4 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

3.4 理论与实践相联系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性学科，图书馆学教育对于实践也一直比较重视，这一点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中非常明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到文革后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专修

科、图书馆学系，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是“馆办系”，即由图书馆负责图书馆学的教学，教师图书馆实践经验丰富，因此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非常重视图书馆工作实践。后来，图书馆学专业从南京大学图书馆独立以后，与图书馆实践领域的联系紧密度略有下降，但是并未脱节。目前，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专任教师中，拥有图书馆实践工作经历的占比近56%，除了专任教师外，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本科的一些专业课程目前也是由南京大学图书馆老师参与授课，同时在图书馆学本科课程中设置了图书馆工作实务（不是实习，3学分）的必修课程，在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图书馆设立了实践教学基地。此外，还开设了“馆长讲堂”，定期邀请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的馆长、副馆长与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同学座谈，以便图书馆学专业同学了解最新的图书馆发展实践。而在图书馆学研究生培养层面，也聘请了图书馆业界人士担任“行业导师”，共同培养满足图书馆界需求的人才。

3.5 立足中国，胸怀世界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形成的另一重要精神底蕴就是“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现代图书馆学是西方舶来品，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也是源自于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等留美先贤，他们把最先进的欧美图书馆学引介到中国，立足中国大地，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在早期图书馆学课程中也有所体现。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南京大学重视国际化合作，开设了国际课程，与剑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等设立联合实验室；另一方面，要求图书馆学师生立足中国实际，研究中国问题，培养适应中国需要的专业人才，例如，金陵大学时期刘国钧创制针对中国典籍的图书分类法，并将其运用到教学之中；如今叶继元教授针对中国实际率先提出研制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并将这些基于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融入“信息资源建设”“学术规范与创新”等课程中。

4 结语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经历百年发展，从人才培养、社会影响、实际贡献来看，都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以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发展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1]，这一百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也遇到了本科教育萎缩、“泛信息化”侵蚀等问题。面向未来，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将坚持人文价值理性，以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作为落脚点，将文化自信作为指向标[22]，理性对待新技术，创新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改革图书馆学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更好地迎接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百年。

参考文献

1 顾烨青，郑锦怀.金陵大学1913年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之疑[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38(3)：50－52.
2 Schedule of course，university summer school [J].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lletin，1922，6(6)：5－20.
3 夏承枫.民国十一年之暑期教育[J].新教育，1923，6(4)：576－578.
4 Minutes of college faculty meeting[A].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馆藏，案卷号：RG011－198－3403.
5 沈固朝.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J].图书情报工作，2005(11)：139－140.
6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74－1.
7 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M].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15.
8 谢欢.李小缘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及思想——纪念李小缘逝世60周年[J].图书馆论坛，2019(10)：69－71.
9 图书馆学会消息[N].金陵大学校刊，1931－11－13(2).
10 金陵大学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计划[A]. 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1644.
11 佚名.五十五年来之金陵大学[M].成都：蓉新印刷工业合作社，1943：7.
12 涂成涣、尹懋文等为要求入金陵大学借读、旁听事与该校领导的往来文书[A]. 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590.
13 金陵大学教职员为兼校外职务及聘请校外人员来校兼课与有关单位的来往信函[A].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150.
14 金陵大学教务会议记录本[A]. 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235.
15 文学院汇讯[N].金陵大学校刊，1947－03－15(1).
16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s，1945－1950[A].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案卷号：RG011－0046－1187.
17 吴名.南大图书馆学专修班学生勤奋学习[J].江苏图书馆工作，1980(2)：80.
18 陈乃林.江苏高等学校图书馆年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186.
19 马费成，李志元.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6)：4－15.
20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03－206.
21 叶继元，徐雁.南京大学在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贡

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5):17－24.
22 左静远.与图情结缘的那些年:叶继元教授访谈[J].新世纪图书馆,2020(1):5－8,1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22 年 5 月 17 日
修回日期:2022 年 9 月 8 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 History and Its Character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Nanjing University

Xie Hua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Nanjing University could be traced back 1922, from 1922 to 2022, Nanjing University'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its spirits through reviewing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Nanjing University'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t mainly use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archives on this topic. The spirits of Nanjing University'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could be summarized to 5 points: insisting on the humanism as well as technology are both important; encourag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combing the research, teaching and service together; comb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ogether; and focusing on China as well as being with the global view.

Keywords: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接第 100 页)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onated Books of Deng Guangming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Rao Yibo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has newly acquired more than 6400 volumes ancient books belonging to Deng Guangming's collection, of which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PKU library's book donation. The collection is well preserved and rich in edition categories, with high literature value and cultural relic value. The contents of the collection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history of Song,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anthology of Song people and history books from Song Dynasty, which can better reflect Deng Guangming's academic purport. It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work records in Deng Guangming's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is the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study of Deng Guangming,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Keywords: Deng Guangming; Ancient Books; Donated Books; Scholarly Style

思想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述论

□刘洁*

摘要 孑民图书室是解放战争时期受中共北京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点的图书馆。在其存在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孑民图书室向北京大学学生及北平中学生群体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加速了青年学生思想层面的革命化,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北平解放后,随着新的历史时期任务的变化,孑民图书室将全部藏书移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永久组成部分,也开始了其向知识传播机构回归的学术化历程。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对于增进了解北京地区青年运动史、北京大学校史、以及图书馆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孑民图书室 解放战争 北京大学 青年运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2.015

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的重要文教机构,为学习、研究和文化传承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在特定历史时期,图书馆也会成为传播革命文献与革命思想的枢纽,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历史变革。成立于1947年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孑民图书室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政治功能突出的图书馆。该室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①,以借阅革命文献为工作重点。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孑民图书室的使命告一段落,全部图书移交北大图书馆,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永久组成部分。孑民图书室的存在时间虽仅一年半,却在北大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或是将孑民图书室作为北京近代图书馆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加以看待[1－2],或是强调其与近现代作家之间的关联[3],对于其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4]。此外,一些亲历者的叙述虽然注意到该室的革命政治功能,但只是属于史料的范畴,未作深入研究[5]。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北大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日记、报刊、忆述资料等,试图还原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孑民图书室,以期推进北京青年运动史、北大革命史、北大图书馆史的相关研究。

1 在革命运动中诞生

抗战胜利后的北大图书馆是当时全国馆藏最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在战前北大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新增伪北大时期收入的木犀轩李盛铎藏书,又于1945年至1948年间多次接收、购买各类机构藏书和私人藏书,馆藏量急剧攀升。1946年馆藏量达

* 刘洁,邮箱:dd-liujie@cass.org.cn。

① 关于孑民图书室的创办,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北大学生创办,如"孑民图书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北大学生自己创办的进步图书机构"(见李庆聪、吴晞编:《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室由学生自治会创办,如"孑民图书室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一个进步图书机构"(见吴晞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事实上,孑民图书室成立于1947年10月21日,其时北大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直至1947年11月23日才成立),由院系联合会代行自治会的职能,故从时间来看,该室不可能由学生自治会创办。此外,据藏于北大档案馆的《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为筹办孑民图书室给胡校长的报告》,该室向校方登记备案时也是以院系联合会的名义进行,而非学生自治会(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页)。考虑到自治会和院系联合会均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本文采用孑民图书室是"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由北大学生创办的"图书机构进行表述。

348949册，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达到724894册[6](103)。又据档案所载，1948年北大图书馆经费开支占学校总支出的7%[7]，可见北大校方相当重视图书资源建设。那么，坐拥百城的北大学生，为何另行成立孑民图书室？

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主要是当时北大学生迫切渴望学习革命理论的结果。1946年至1947年，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在中共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大学生多次走在北平学生运动的前列，校内出现了许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及中共政纲的左翼读书会。但这些读书会所需要的革命文献却不易获得，这是因为：一、国统区通胀严重，青年学生的购书能力十分有限，而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书刊的订购不足[6](105)，一些左翼报刊如《文汇报》、《新华日报》等几乎不购[8](44)，尽管学生多次促请图书馆增订左翼书刊，均遭拒绝；二、一些革命书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印刷品，其出版传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

受以上因素影响，革命文献十分难获取，学生们便将各自的左翼书刊凑到一起，形成一批公用书刊。北大大一学生会①就是用这个办法积累了一百多本书刊，形成孑民图书室的雏型[9](26)。北平其他大学的学生也用类似办法成立了左翼图书馆，如清华大学的一二一图书室等。1947年秋，大一学生即将升入大二，“大一学生会”行将解散，该如何处理这些书刊？大一学生会主席、史学系地下党员周桂棠和他的同班同学陈宗奇决定以这批图书为基础，成立一个以借阅革命文献为特色的图书室，受北大院系联合会领导[10]。周桂棠先是将书交给史学系同学戴秉衡②保管，很快，陈宗奇也参加保管[9](26-27)，几个人立即开始创办图书室的行动。

首先，他们需要确定图书室的名称和宗旨。经过商议，决定以老校长蔡元培的字“孑民”来命名图书室，这样一是寓意“兼容并包”的办馆宗旨，易于得到北大师生的好感；二是政治色彩有所淡化，有利于安全。与之相应，藏书种类也尽量做到兼容并包，不局限于革命文献[11]。名称和宗旨确定下来之后，图书室开始募集图书，很快募到900余册图书，加上大一学生会原有的100多册书，至正式成立时，共有约1200册图书[12](178)。

其次，孑民图书室的成立本就是在校图书馆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本身也设在北大校内，这就必须取得校方的谅解和支持。为此，图书室首先尝试争取校长胡适的支持。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胡适对孑民图书室的态度是：“认为学校有图书馆，这事没有必要”[11]。另一份成稿于1948年3月的内部工作报告则写道：“因为和学校的关系没有弄好，尤其是胡适的态度一直都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所以使她的发展受到地方的限制，直到现在仍然是在一间很小的房间中”[13]。由此可知，胡适并不赞成成立孑民图书室，因此该室只能以原“大一学生会”的社址为阅览室，是为红楼一层167号房间[9](26-27)。

在胡适处受挫后，图书室转而寻求教授们的支持，写信聘请他们担任图书室名誉导师。为礼貌起见，学生们也给胡适寄了聘书：“本会经过数日筹备，已大致就绪，为纪念蔡孑民先生起见，拟定名为孑民图书室。并拟请校长为名誉顾问，指示一切”[14]。尽管北大图书馆所藏的油印版《孑民图书室组织大纲》的“我们的导师”一栏中有胡适[15]，但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的一份成稿于1948年6月的文件，聘书寄出后，胡适“却一直没将允聘书交回”[11]，意即胡适没有允聘。考虑到胡适最初就不赞成成立该室，本文倾向于认为，他没有答应担任导师。胡适此举自有其考量所在，他心知学生创办孑民图书室是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身居国统区大学校长位置的他，自不便加以支持。

虽然胡适态度如此，其他教授却大多欣然允聘[11]。考察其中缘由，一是一些教授希望借此了解中共的政纲和解放区情况，二是也有一些教授对成立图书室的政治意图不甚了解。诚如该室的工作报告所言：“大部分教授觉得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东西，所以不会理解到她所起的别的作用”[13]。由于得到教授的支持，孑民图书室在和校方交涉时就获得了转圜的余地，相当于获得“半合法”地位。以此之故，1948年3月，在提及校方的态度时，该室自嘲道：校方“起初在表面上反对，现在表面上也敷衍敷

① 大一学生(1946级学生)是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的群体，在全校学生自治会尚未成立时，大一学生会率先于1947年初成立。

② 1948年下半年，戴秉衡离开北京大学，奔赴解放区，改名戴逸。

衍”[13]。

有了一些书刊，有了阅览室，有了教授们作为名誉导师，孑民图书室开馆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遂于1947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图书室下设管理股、募集股、资料研究股、总务股、编目股、联络股等机构[13]。在隶属关系上，图书室先是受北大院系联合会领导，1947年11月北大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改隶于学生自治会学艺部。由于学生自治会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故该室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党工作的组成部分。

2 在革命中艰难发展

孑民图书室成立后，面临扩充书刊、图书编目、筹集经费、寻找房源等日常性困难。本节就这些日常性困难展开讨论。

第一，由于缺乏资金，图书室面临扩充书刊的难题。为此，他们采取了以下办法。一是在校内师生中募集图书，发动师生捐献多余书刊。二是利用捐款买书。三是经沈从文等名誉导师介绍，给各出版社和文化名人写信募书。沈从文不但直接写信向朋友们募书，还给学生提供募书线索，譬如让上海学生利用暑期返家的机会去找《大公报》记者刘北汜，通过刘获得许多其他作家的联系方式[16]。1947年秋，孑民图书室就是用这个办法给全国各地的出版机构、书店寄去1000多份捐册。至当年冬天，这些捐册陆续收到回音，“一包包的新书不断从邮局送来，四十多种杂志也相继寄到”，此外还收到巴金等著名作家的赠书，其中最富有价值的当属许广平捐赠的《鲁迅全集》纪念本[12](178-179)。

孑民图书室的第四个图书来源是北大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书店——文化服务社。文化服务社位于北大民主广场的一间平房，借助北大校园不易受国民党军警直接干涉等有利条件，翻印、售卖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和解放区的革命书刊，以此颇有盈利[17]。由于孑民图书室与文化服务社同受北大学生自治会领导，经过自治会和地下党的协调，文化服务社对孑民图书室从经费到书源上都给予很大支持[18]。通过以上几种方式的努力，图书室藏书不断增加。1947年10月开馆时仅有1200本书，不到一年后的1948年7月，已有书籍5000余本，资料2000余册，杂志40余种[19](44)。

在藏书种类上，孑民图书室尽量广收各类书刊。馆藏的全部图书中，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仅占10%，其余大部分是国统区普通图书。报刊杂志也是如此，左翼报刊仅占20%，《观察》等一般性报刊占70%，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背景的刊物[13]。这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北大当时虽有“小解放区”之称，毕竟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孑民图书室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安保”措施。事实上，那些国民党背景的书刊在关键时刻很能发挥作用。一次，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人查看孑民图书室，大家便把馆藏的《中国之命运》摆放在显眼位置，把中共的《群众》杂志收起来，于是安然过关[20](48)。

第二，孑民图书室成员均非图书馆学专业出身，图书编目是他们的难题。图书室先后进行过两次编目。第一次是创馆初期，由毫无编目经验的7名史学系、中国语文学系（以下简称中文系）等专业的学生用4天时间仓促完成[19](46)。这次编目的缺点很快暴露出来：“编目类别太少，有很多缺门，分类方法也不尽合理，来了新书插不进去，勉强插进去，谁也查不到”，图书室遂决定在1948年暑假进行第二次编目。这次编目吸取前次教训，向袁同礼、余光宗等图书馆学专家请教，认真参考刘国钧先生所著的关于图书编目的著作，结合图书室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套相对科学的编目方法[20](49-50)。由于藏书量剧增，编目量变大，参与此次编目的人数远多于第一次，室友、同乡、同班同学均被发动参加，大家“紧张战斗了两个星期，最后一天开了一个通宵夜车，终于将五千多册书全部编好了目”[21](36)。

第三，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孑民图书室。在图书室工作的学生均是无偿服务，即便如此，诸如“写信须要邮票，募捐要印捐册，编目没有卡片，出壁报又没有纸”等基本费用仍不可避免[12](179)。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经费问题更形突出。事实上，图书室开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经常费，即维持图书室基本运转的办公费用；二是谋求图书室发展壮大的购书费。经常费由院系联合会（后来改由学生自治会拨）按月拨给，1947年下半年每月拨50万至100万[11]。随着物价上涨，1948年3月增至每月150万。参照当时物价指数，这些数额还不及一个大学生每月的基本生活费[22]，因而非常拮据。图书室屡次向北大训导处请求补助，均被答以“学校无钱，如果教育部有课外活动费用，一定给你们”[23](147)。此外，图书室还通过义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来募

款[23](128)。社员陈宗奇将自己的生活费(当时称为“公费”)也捐给了图书室[23](126)。中学生在图书室办读者证所缴纳的保证金亦被充作经费[23](151)。至于图书室的购书费,主要靠节庆日大型募捐获得,其中以1948年5月4日校友“返校节”的募捐最为成功。当天,图书室全体成员分为八个宣传小队一齐出动,共募得6500余万元[11]。孑民图书室决定将这次募捐所得全部用来购书。

第四,图书存放需要空间,房屋是图书室的又一大难题。由于胡适最初即视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为“‘多余’之举”[22],该室向校方申请扩大房屋便屡遭挫折,从成立至翌年7月一直“屈就”在红楼167号的狭小房间中,十分拥挤:“每天有好几百人在这里读书、看报、翻阅杂志,这里是拥挤的,甚至出入都得小声说‘劳驾,劳驾’”[19](44)。经过反复交涉,1948年2月底,校方终于同意将红楼一间地下室拨给孑民图书室。从此,红楼167号是办理借还书的阅览室,红楼地下室则是图书室成员日常工作和交流的场所[11]。随着藏书愈来愈多,红楼167号也渐渐容纳不下,需要更换一间更大的阅览室。校方表示碍难解决,图书室只好从学生方面着手,劝说一些住在红楼的学生搬至其他宿舍,以腾出空间做阅览室。这样,1948年7月,阅览室先是从红楼167号迁至红楼104号,待秋季开学后,经校方同意,又从104号迁至160号[12](181)。从此,孑民图书室才算安居下来。

尽管面临募书、编目、募款、寻房等几大日常难题,孑民成员们却以巨大的热情克服困难,使图书室在困难中发展壮大,从而真正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作用。

3 成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

根据孑民图书室内部工作报告,该室的作用是:“(一)教育同学、服务同学(包括北大及中学同学);(二)吸收一部分中间同学参加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改变”[13]。其中,前者是就读者而言,后者是就图书室工作人员而言。因此,图书室的革命宣传作用是双向的:既向读者传播革命思想,又借由图书室的工作培养一批革命干部,发挥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作用。在国统区从事这一工作相当危险,但孑民成员们藉此锻炼了应对危难的本领,也愈发坚定了革命意志。

3.1 推动工作成员群体的革命化

检视孑民图书室的成员队伍,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大多是历史或中文专业出身。在初创成员中,陈宗奇、戴秉衡、周桂棠均来自史学系,田觉狮来自中文系。其后,他们又介绍本系的同学加入图书室。可见,初创者的学科背景和人际网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室后来的人员构成。此外,文史专业自身的学科特性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因素之一。自抗战以来,文史专业、尤其是史学专业,向有关心国是、积极参加学运的传统,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选择史学专业的,往往是一些本来就高度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人[24]①。对此,《北大1946—1948》一书称,“史学系同学在北大是颇为活跃的……他们希望能从历史的发展里发现新的道路”[19](16-17),此言不虚。由于这些因素,孑民成员以文史专业为主。

孑民成员的第二个共性是喜爱阅读、性格内向、不喜张扬。当时地下党在北大成立了许多社团,歌舞类的有沙滩合唱团;文学创作类的有文艺社;体育类的有北星体育社,以便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爱好。关于孑民图书室所吸引的特定人群,孑民成员李德文做了精辟总结:

“有的喜欢读书;有的性格好静;有的不善于或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进行活动;有的参加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感到需要坐下来读点书充实提高自己,有的甚至看不惯那些跳跳唱唱、大喊大叫的人,认为是在出风头,而愿意做点要静一点但实实在在的工作;等等。他们喜爱‘孑民’丰富的藏书和安静的环境,自愿来工作,工作起来是那样的踏实、认真、负责”[21](39)。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这些性格内向的爱书人士来说,在孑民图书室工作既是服务他人,同时也充满乐趣。戴秉衡自承:“我素性爱书……保管这点书籍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乐趣”[9](26)。尽管他们最初加入孑民的动机是为了看书方便,但在与革命文献的朝夕相处中,他们自身也逐渐革命化。社员杜槐林就是一个典型。在孑民图书室成立之前,杜槐林曾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运动结束后,地

① 何兆武曾分析自己选择历史专业的原因:“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下党员何璞荪有意介绍他加入民青①。但杜对民青一无所知，误以为民青就是民盟，故以“政治上赞成、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他们的组织”为由婉拒[25]。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即许多学生出于一时热情而参加游行，游行结束后，思想觉悟并没有根本提升。直到加入孑民图书室，杜槐林“读到了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书刊，在革命思想哺育下，逐步成长起来参加革命”[20](47)。1948 年底，杜槐林经陈宗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47)。许多其他的孑民成员也是在图书室工作期间发生了类似的思想转变，从而加入了民青或中国共产党，可见孑民图书室确实对其成员起到了“像春天的毛毛雨似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0](47)，推动了他们的革命化。

3.2 推动读者群体的革命化

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孑民图书室的另一作用是推动读者的革命化。图书室的读者群体分校内和校外两部分。校内读者凭学生证免费借书，每天都有几百人来借阅书刊，即便是夏季的午休时间，当大部分人在午休时，该室仍“坐满了看书、查报纸、摘笔记的人”[26]。因书刊供不应求，为加快流通速度，图书室规定一本书只能借出 7 天，逾期罚款。史学系学生罗荣渠在其日记中记到，因逾期一天而被罚了 5 万元[27](334)。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思想上处于中间状态的罗荣渠，却跑到孑民图书室借阅《马克思传》，可见那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潮流。同样处于中间状态的中文系学生艾治平也是图书室的常客，晚年回忆时曾特意提及：“对我来说，她还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得到任何政治违禁的书，往往来这里挤进一个角落里阅览。有时为赶还书的时间，怀里揣着两个窝窝头，便是一顿午餐”[28]。其实，即便是思想保守的学生，也常去孑民图书室看书[29]。据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该室读者以中间立场的最多（占 50%），其次是左翼读者（占 40%），立场保守的读者占 10%[13]。

除北大在校生读者之外，孑民图书室还有一些来自校外的北平中学生读者，数量约相当于前者的 1/4[13]。

向中学生开放借书，是中共地下党对北平学生运动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当时北平学运主要在大学开展，中学生较少参加，这导致“在中学的工作，远落于形势之后”[30]。为此，中共北平党组织采取过许多举措加强中学生工作，先是邀请中学生到北大参加 1947 年五四纪念活动，后又于 1948 年年初举办面向中学生的寒假补习班，均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受中共北大地下党领导的孑民图书室，正是在此情形下决定向中学生开放借书，藉此播撒革命火种。

这项工作不易开展。其一，中学生面临升学压力，又多在北平住家，受到学校和家长的双重约束，较难发动；其二，联络中学生需要跨校，意味着更多不确定的危险；其三，中学生的思想状况不好掌握，地下党不易找到可靠的联络人，必须制定一套安全可行的办法。1948 年 2 月，图书室先是通过华北学联联络部、寒假补习班教师等关系，调查各中学中较为积极的学生，发给他们“基本读者证”作为借书凭证，再由他们将书刊分给本校进步学生[11]。为保障中学读者安全，读者证上仅印有编号和图书室章印，其他关于读者姓名、学校、住址等信息均登记在另一笔记本上，由一位同学专门保管。每当学校面临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危险时，就把这个笔记本藏起来或者销毁[31](54)。此外，图书室还编印一份辅导中学生功课的刊物《学习》。

据一位汇文中学学生回忆，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孑民图书室借了数十种图书，例如《我的童年》《在人间》《大众哲学》等。后来，这位中学生因从事革命工作而离开汇文中学，每当他到北大民主广场与地下党员见面，“不是先到就是后走，为的是挤出时间去红楼孑民图书室翻阅近期出版的报刊”，这成为他的习惯[32]。基本读者数量最多时曾达 800 多个[21](37)，考虑到一个基本读者证往往由多人同时使用，实际受影响的中学生人数则远超过 800 人。

3.3 应对危机、迎接解放

革命本身意味着危险。孑民图书室先后两次面临国民党当局施加的巨大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 1948 年 4 月的“四月风暴”。1948 年 3 月底至 4 月中下旬，国民党北平当局接二连三镇压学生运动，学生连续罢课半个多月，北大校园随时可能被军警闯入，孑民图书室处于危机之

① 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1945 年初成立于昆明。

中[33]。4月11日，北大红楼和东斋遭遇砖块袭击。当天，图书室决定闭馆，同时组织珍稀革命文献进行“逃难”。为寻找合适的藏书地点，同学们决定把一部分书藏在红楼锅炉房。该房在冬季是供暖房，其他季节闲置，不易受人注意。从工友处拿到锅炉房钥匙后，同学们把书刊放进一人多高的大锅炉中，用废纸盖好，钥匙由专人随身保管[31](55-56)。此外，还有一部分书被藏在红楼屋顶和灰楼，后者因系女生宿舍，军警不能轻易闯入，是历次学运中藏书藏人的不二之选。与“书籍逃难”同时进行的，是基本读者名单的“逃难”。直到4月20日，“四月风暴”进入尾声，孑民图书室才将疏散出去的书刊搬回来[23](133-135)。在此前后，由于大部分学生投身于学运之中，来孑民图书室看书的人明显变少，中学生更因为政治高压而不敢来北大借书[11]，所幸没有书刊和人员损失，随着运动结束，危机也告结束。

第二次危机是1948年8月的“八一九”大逮捕及其余波。1948年8月19日、8月20日，国民党当局以“肃清奸匪职业学生”为由，将涉及93名北大学生的待“拘提”“传讯”名单送达北大，要求校方交人。在这93人中，大部分人不在校，此外仍有15人滞留在北大沙滩区。经过校方反复与北平当局交涉，军警最终未能入校逮捕。8月24日，北大训导长贺麟陪同北平市警察局的几位要人巡视沙滩区一圈，封锁即告解除[34]。困在沙滩区的“上榜学生”得以离开北大，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学籍[35]。这次事件一般被称为“八一九”大逮捕。

对孑民图书室而言，“八一九”造成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书刊，二是人员。首先，图书室再次被迫转移馆藏革命文献。由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八一九”期间先后遭军警入校搜查，同学们因此担心北大也将遭到搜查。以此之故，孑民图书室在事件发生后很快转移了革命文献。此次转移远比“四月风暴”时间长，直至北平和平解放，这批图书才返回书架，重新流通[23](152,175)。

其次，图书室人员也面临青黄不接。“八一九”大逮捕发生后，“上榜学生”均不能返校，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自治会理事，结果造成“自治会因为理事大都走光几乎不能展开工作”[27](406)。北大为此在1948年秋季举行新一届自治会改选，许多孑民成员因当选为自治会理事而退出了图书室[23](161)。此外，在临近解放之际，大批学生奔赴解放区，其中就包括图书室骨干成员陈宗奇、杜槐林等人[23](168)。这些人的离开和退出，使图书室几乎难以为继。留下来的人，工作热情也不高。围绕北平的战与和，大家日夜关注局势进展，聊天之风盛行，谁也无心工作，来看书的读者也很少[23](172-173)。凡此，使1948年下半年的孑民图书室在书籍、读者、工作人员等三个方面俱显寥落。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预示着孑民图书室即将完成阶段性使命。图书室成立的初衷本就是用革命文献教育学生，同时吸收一部分中间分子参加革命。至北平解放前夕，大批学生完成了革命化的思想转向，成批离开校园，奔赴解放区，这预示着新的历史阶段即将到来。

4 结束与新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身处历史转折关头的青年学生面临着抉择。如前所述，1948年下半年，大批学生前往解放区或南方，使全校注册人数从1948年10月的2901人[36]减至1949年初的2269人[37]。1949年上半年，北大掀起参军参干的热潮，学生人数进一步减少至1871人[37]。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各大学时，就遇到“学生中进步的优秀的南下与投考三大学者太多，影响学生工作”的问题[38]。因此，一方面是学生人数大量减少，一方面是解放后的北大百废待兴，开展工作亟需人手，于是往往出现一人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在上述形势影响下，孑民图书室的工作人员和读者人数进一步减少，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被提上图书室的议程。1949年三四月间，孑民图书室为此专门开了一次会。

会上出现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孑民图书室在解放前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压制，现在压制已不复存在，应趁机扩大发展。第二种意见认为，孑民图书室的产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即北大图书馆以前没有充分满足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现在既已解决这一问题，孑民图书室也就不必再办。第三种意见则主张逐步过渡。鉴于北大图书馆正在调整，因而对孑民图书室不能遽然取消，而应分步骤地将其藏书移交给北大图书馆[39](83-84)。

最终第三种意见占了上风，江孝绰和赵树芝两位同学受命前去北大图书馆联络。新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欣然同意接受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书，决定先派几位职员到孑民图书室值班并管理借

还书，以便于孑民成员们立即脱身出来，从事新的工作[40]。其后，北大图书馆对孑民图书室的全部藏书、卡片和文书档案进行清点、交接，重新向师生开放借阅，馆址也从红楼迁到孑民堂附近的一个院子，继而迁到沙滩北大图书馆二楼西侧的大阅览室。1952年，又随北大搬到燕园[41]。从此，孑民图书室的藏书成为北大图书馆馆藏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带有“孑民图书室”中文字样和“Jye-Min Memorial Library”英文字样的蓝色印章的孑民图书室藏书仍在北大图书馆被广泛借阅和使用，成为北京大学知识宝库的一部分。

考察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发展过程，能够丰富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历史细节，再现那一代北大学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勇于探索救国真知的精神风貌，重申北京大学爱国进步的精神传统。同时，孑民图书室的历史变迁也反映了近代图书馆兼具知识传播功能和革命政治功能的双重功用及其相互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换。知识传播功能是图书馆的常态功能，革命政治功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非常态功能。在革命年代，孑民图书室主要是发挥作为“革命的精神加速器”的非常态功能，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加速青年学生思想层面的革命化，从而推动革命取得胜利。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革命时期走向建设时期，孑民图书室完成阶段性使命，并入北大图书馆，开始向常态化的知识传播机构回归。对当今读者而言，孑民图书室的藏书和北大图书馆其他藏书一样，俱是获取知识、开展研究的历史文献和工具，而其革命精神则融入了北大图书馆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当中，历久而弥新。

参考文献

1 郭松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沿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72－79.
2 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续)[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5)：55－58.
3 何颖，吴国彬.孑民图书室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影响探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31(6)：93－97.
4 李庆聪.北大人的精神粮仓——介绍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04－117.
5 罗歌.突击黑暗 争取光明——记孑民图书室的诞生[J].图书馆学通讯，1980(2)：21－29.
6 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 校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至第六次会议[A].北京大学档案馆藏：BD1947003－1.
8 艾治平.今日的北大[M].出版者不详，1947.
9 戴逸.回忆孑民图书室的草创[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 沙叶.我所了解的孑民图书室创办经过[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3－24.
11 张莉莉.关于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有关档案史料[J].北京档案，1987(4)：34－37.
12 一年历程缩影——孑民图书室一年来工作报告[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3 张莉莉.关于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有关档案史料(续)[J].北京档案，1987(5)：29－31.
14 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为筹办孑民图书室给胡校长的报告[M]//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71.
15 孑民图书室组织大纲[A]//孑民图书馆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6 沈从文.沈从文的两封信[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26.
17 朱彤.北京大学文化服务社战斗的日日夜夜[M]//北京大学校友会.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91－593.
18 王立行.对孑民图书室的片断回忆[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
19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北大1946－1948[M].出版者不详，1948.
20 杜槐林.回忆孑民图书室二三事[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1 李德文.忆陈宗奇同志[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2 林杰.新的精神粮库——介绍北大“孑民图书馆”[J].燕京新闻，1948，14(21)：4.
23 干事会会议记录[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4 何兆武.上学记(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99.
25 杜槐林.回忆何璞荪点滴往事[M]//黄大用，何祚宏.宛若流星：何璞荪纪念文集.自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09－110.
26 沙滩一日[N].北平学生，1948－09－07(2).
27 罗荣渠.北大岁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8 艾治平.人生自是有情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57.
29 余传韬.北京大学学生生活回顾与感想——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及一百周年校庆亲历记[J].传记文学，1998，73(3)：35.
30 北平学委工作计划[M]//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7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55.
31 萧漪.在“孑民”的日子里[M]//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2 谢龙.滋养幼苗的阳光、雨露——忆北大孑民图书室中学生读者二、三事[M]// 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2.
33 平津地区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材料[M]//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8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3－85.
34 军警宪负责人员往访胡适校长[N].益世报(天津)，1948－08－25(3).
35 王效挺.关于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及黑名单的一些情况[J].北京大学校友通讯，1995(17)：14－16.
36 三十七学年度第一学期注册人数统计表[M]//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27.
37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七学年度第二学期学生人数统计表[M]//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4.
38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M]//北京市档案馆.北平解放：(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469.
39 李若愚.记孑民图书室的一次例会[M]// 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0 江孝绰.难忘的岁月——回忆孑民图书室中后期的工作[M]// 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2.
41 赵新月.孑民图书室胜利地完成历史任务[M]// 李庆聪，吴晞.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收稿日期：2022年5月8日
修回日期：2022年8月24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Thought and R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Liu Jie

Abstract: The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was led by the Branches of Peking Univers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founded by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borrowing Marxist books and disseminating Marxist ideas. In the short period of one and a half years of its existence, the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has widely spread revolutionary ideas to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eiping, accelerated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young students, set off a mass movement to learn from Marxism, and effectively cooper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Liberation W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Beiping, with the change of task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handed over all its books to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ecoming a permanent part of it, and also began its academic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the knowledge carrie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is of grea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youth movement in Beijing, th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library.

Keywords: Jye-Min Memorial Library; Liberation War; Peking University; Youth Movements;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